

DOI:10.16033/j.cnki.33-1055/g2.2025.03.006

苏联档案专家与新中国的档案事业 (1949-1956)

■ 奈丽 (Neli Akhobadze) /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派遣了几位档案专家协助中国建立系统、规范的档案管理体系。米留申、谢列兹聂夫和沃尔钦科夫是主要的几位苏联档案专家,他们通过调研考察、撰写报告与座谈、翻译出版等方式,参与到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建设中。苏联专家的到来推动了中国档案管理体制的建立,加强了档案工作的重要性,并影响了中国档案教育体系的发展,为后续的档案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 苏联;米留申;谢列兹聂夫;沃尔钦科夫;《档案材料》

1 引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对新政权提供了大量援助,派遣顾问和专家群体便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除了军事、工业和技术等领域有相关专家外,当时也有少量档案领域的专家来华,帮助新中国建立和完善档案管理体系。尽管与其他领域相比,来华的苏联档案专家人数屈指可数,但他们在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关于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历史的著作,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及其档案专家的影响问题,大多仅作浮光掠影式的处理。尽管在部分论著或回忆性文章中会提及米留申、谢列兹聂夫、沃尔钦科夫等几位专家,但对苏联档案专家相关情况的考证与分析仍显得简单,甚至很多苏联专家的俄文名字都未能准确厘清。本文借助《档案材料》等一手资料,结合中国与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群体在华活动及其对中国档案专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梳理,以为后续研究提供基础性参考。

2 派遣来华的苏联档案专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档案工作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

础,亟需建立系统化、规范化的管理体系。然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档案工作在机构设置、管理方法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在此背景下,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派遣了一批档案专家来华,协助开展档案工作。在1949至1956年间,多位苏联档案专家相继来到中国,协助新中国的档案工作。主要的几位专家包括米留申(Ф.И.Милушин)、谢列兹聂夫(М.С.Селезнев)和沃尔钦科夫(Г.И.Волченков)。

第一位来华的是米留申(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Милушин)。关于米留申,虽然有诸多回忆,但其个人的基本信息却不甚明确。首先是他的俄文名字。中文文献中查不到他的俄文名字,而相关当事人也毫无印象。当时接待过苏联专家的中国人民大学韩玉梅教授,在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认为,米留申来中国的时候没人注意他的俄文姓名,所以在中文材料上只保留了他俄文姓的中文译音——米留申。笔者通过联系俄罗斯国立档案馆副馆长Н.В. Бабурина,才查到这位苏联档案专家的俄文名字为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Милушин,出生于1913年。此外,关于米留申在苏联的工作职位,说法不一。在一些中文文献中,称其为“苏联档案专家”。比如1950年9月政务院秘书厅汇编的《关于档案工作及文书处理的参考资料》一书,就用“苏联档案专家米留申著”。米留申1950年4月5日撰写的最早的一份材料《对于目前中央各机关档案工作及文书处理的意见》,也自称“苏联档案专家”。后来的回忆文章和研究论著一般称他为“苏联中央档案管理局副局长”^[1]“苏联档案管理局副局长”^[2]或者“苏联国家档案总局副局长”^[3]。通过俄罗斯国立档案馆副馆长,笔者确定当时他的身份应该是苏联内政部中央国家特别档

档案馆副馆长。1949年，米留申随苏联政府代表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后，留在中国工作。此后，他深入调查了20多个机关的档案工作情况，指出了档案管理混乱、文书处理不规范等问题，并草拟了《中国档案管理机构的组织条例》《文书档案工作暂行办法》《保管期限表》等重要文件。此外，米留申还通过多次演讲和报告，系统介绍了苏联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

第二位来华的档案专家是苏联国立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的讲师姆·斯·谢列兹聂夫（Михаил Степанович Селезнев）。这位1913年出生的农家子弟，1935年进入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学习，其后参加苏联红军。二战结束后，他在国立莫斯科国家历史档案学院攻读学位，并于1950年获得副博士学位。1952年10月，谢列兹聂夫受中国人民大学邀请来华，担任档案专修班的主讲教师。在中国期间，谢列兹聂夫讲授了“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苏联文书处理工作”“苏联档案史”等课程。他还协助翻译和出版了多部苏联档案教材，培养了一批档案专业的教学与研究人才。此外，谢列兹聂夫积极参与中国档案教育体系的创建，帮助筹建档案教研室，培养了第一期研究生，并为成立历史档案系做了大量准备工作^[4-8]。1955年6月，谢列兹聂夫结束在华工作回国。回国后，他担任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副校长^[9]。

姆·斯·谢列兹聂夫回到苏联后一年多，中国国家档案局聘请了第三位苏联档案专家格·伊·沃尔钦科夫（Г.И.Волченков）。据相关回忆和研究，在谢列兹聂夫回苏联以后，中国领导人曾反对继续邀请苏联档案专家来中国——“周总理当时是不主张请的，说请专家不如派人出去看看”^[10]。不过，中国国家档案局还是在1956年10月5日聘请了苏联档案专家格·伊·沃尔钦科夫^[11]。

格·伊·沃尔钦科夫俄文全名为 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Волченков，1910年出生，毕业于莫斯科城市师范学院历史系，1940年参加工作，1945—1948年担任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科学出版部部长，1948—1954年担任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馆长。在中国期间，他帮助中国档案工作人员制定了多项业务指导性文件，并提供了多次业务咨询。尽管他在华时间较短，仅九个月，他的工作成果对中国档案事业的规范化和系统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除上述三位档案专家外，还有一些苏联档案工作者对中国档案事业产生过间接影响。例如，中央编译局聘请的苏共中央档案馆副馆长谢皮洛娃（Щепилова），她

作为翻译顾问来华，并为中国档案工作者做过报告。还有一些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虽不属于档案领域，但在讲授相关课程过程中，为中国档案工作者介绍了苏联档案工作的经验。例如，布尔科（П.Н.Берков）、罗马诺夫（Романов）、阿·阿·库金（А.А.Кудзин）等专家的讲稿被汇编成《技术档案整理与保管》一书，对中国档案工作者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于关于这些专家的信息有限，本文暂不涉及。

3 苏联档案专家在华的主要工作

苏联档案专家在华期间，主要通过调研考察、撰写文件、讲座授课、翻译出版等方式，向中国介绍苏联档案管理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推动中国档案工作的规范化和系统化。来华的档案专家都曾通过考察调研，对中国档案工作的现状进行了全面地了解，为后续的档案管理体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依据。1949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米留申先后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中央组织部、军委总政治部等单位参观、调研档案工作。在此基础上，他认识到当时档案工作存在的种种不足。12月27日，米留申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召开的档案工作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档案工作的一般问题及中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缺点》的报告，总结了当时中国政府档案工作中存在的四个问题。第一，全国范围内缺少一个受政府委托从事解决有关档案的一切问题的专门领导机关；第二，对档案的保管分散混乱；第三，因对档案工作缺乏统一领导，所以没有人来监督现有各机关部门的档案保管；第四，在档案工作中缺少必要的政治警觉性。此后，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各个机构收集、保管、整理档案、材料等情况，米留申还用了两个月时间调查了19个部与中央机关，包括政务院、中央政府办公厅、军委、最高人民法院、财委会、政法委员会、科学院、内务部、公安部、文化部、教育部、司法部、文委会、新闻总署、出版总署与新华社等的档案工作情况。通过调查，米留申发现档案管理存在分散、混乱、缺乏统一领导等问题。他特别注意到，档案的保管缺乏统一标准，很多机关的档案室都没有系统的档案分类和整理方法，档案的管理显得非常随意。在对东北图书馆的考察中，米留申提出应借鉴苏联的经验，进行档案材料的科学分类和规范化管理。他在完成调研后，于1950年4月撰写了《关于目前中央各机关档案工作及文书处理的意见》。米留申详细列举了中国档案管理中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建立档案管理体制的必要性，特别强调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对档案工作的核心作

用。此后米留申还草拟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档案局暂行条例（草案）》等档案管理规则。

谢列兹聂夫和沃尔钦科夫也在工作期间参与了对中国各地档案工作的考察。谢列兹聂夫在多个省市进行了实地考察，重点了解地方档案管理的现状，并结合苏联的经验为中国提出了科学整理档案的建议。沃尔钦科夫在中国的时间虽然仅有9个月，但也走访了不少地区。1957年2月26日至4月5日，中国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陪同沃尔钦科夫赴湖北、湖南、广东、浙江、上海、江苏等6个省视察档案工作。在视察过程中，沃尔钦科夫还做了报告^[12]。

报告和座谈会是苏联档案专家传播档案管理经验和改进中国档案管理方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米留申在1949年12月27日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的档案工作座谈会上，做了题为《关于档案工作的一般问题及中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缺点》的报告。在报告中，米留申详细分析了档案工作存在的四大问题，包括缺乏统一领导、档案工作分散、档案保管无序、缺乏政治警觉性等，并结合苏联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方案。谢列兹聂夫也通过报告的形式，向中国档案工作者传授了苏联档案工作的情况。1952年，谢列兹聂夫在北京举办了一次档案工作者大会，他在会上分享了苏联档案管理的基本原则，强调档案的科学分类、严谨管理和保密性。他还对各机关如何在档案管理中实现文书的标准化处理进行了讲解，并在报告后回答了档案工作者提出的相关问题。沃尔钦科夫在华东、华南地区考察时，也举行了讲座。在湖北和湖南约有700人听讲，在广东、浙江约有1200人听讲，在上海和江苏来听他报告的人超过了2000人^[13]。

在大学和机关授课或开展讲座是苏联专家传递档案管理知识的又一方式。谢列兹聂夫主要在中国人民大学授课，讲授了“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苏联文书处理工作”“苏联档案史”等课程^[14]。他还积极参与中国档案教育体系的创建，帮助中国人民大学筹建档案教研室，培养了第一批档案专业教师和学生。据统计，从1952年成立档案专修班开始，谢列兹聂夫在华的三年时间里，共为专修班3期311位学员讲授了相关课程^[15]。沃尔钦科夫在中国期间，也在中国国家档案局做了多次讲座和报告。他通过这些讲座和报告，向中国档案工作人员介绍了苏联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和方法。他的报告内容包括《苏联档案工作的组织》《苏联档案管理机关和档案馆鉴定工作的经验》《苏联地方国家档案馆的建立及其接收档案工作》《苏联档案机关利用文件材料的工作经验》等^[16-19]。

为了系统地传授苏联的档案管理经验，苏联专家参与了大量档案教材的翻译和出版。谢列兹聂夫在中国期间，有意识指导中国人民大学相关院系翻译和出版了多部苏联档案教材，包括《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苏联档案史》《苏联档案公布学》《苏联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等。他还特别重视对翻译人员的培养，经常检查翻译的工作，要求每位译员制订个人计划，并亲自检查执行情况。在他的培养下，至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培养出了4个懂得专业知识的翻译员。借助这些专业人员，翻译苏联的档案工作相关文献。在政务院秘书处的推动下，米留申在中国期间的有关文章被汇编成《关于档案工作及文书处理的参考资料》一书，这本书成为新中国初期档案工作者重要的参考文献。根据韩玉梅在1957年的统计，自1950年以来，苏联赠送给中国的档案工作材料“共有150多种，共500万多字”。其中，翻译与公开出版“共计861000字，310000册（还有内部发行一种1000册）。翻译和印发供内部参考的有苏共档案工作条例汇编、关于档案工作及文书处理工作的参考资料、关于文书处理工作与文书处理工作的各种论文、课程大纲等30多种，约160万字”^[20]。

此外，苏联专家通过举办专业期刊传播档案管理知识，其中最典型的的就是《档案工作》创刊和出版。1950年4月5日，米留申在中央各机关档案工作及文书处理工作的报告上提出过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包括出版档案工作理论与实际交流的定期刊物，并通过这份期刊交流中国档案工作经验、各个机关遇到的问题、翻译档案事务的外国科学著作问题^[21]。在米留申的建议和推动下，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于1951年5月开始出版《材料工作通讯》^[22]。该刊物“是档案和资料工作者互通情况、交流经验的一种内部不定期刊物”^[23]。1953年6月，刊名改为《档案工作》，开始刊载关于苏联档案工作经验的文章和著作。而谢列兹聂夫在中国期间所作的演讲、报告及其他参考文献，几乎都通过《档案工作》期刊分享给中国各地的档案工作人员作为参考^[24]。

4 苏联专家对中国档案事业的影响

来华的苏联档案专家人数虽少，但是他们的工作对于新中国初期的档案事业有着重要影响。首先，推动中国建立统一的档案管理体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档案管理仍处于无序和分散的状态，各机关、团体和地方政府档案工作大多由各自的机关独立管理，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这一局面严重制约了档案管理效率和档案资源的

有效利用。1950年8月28日，米留申在中央机关秘书、档案工作者座谈会上，强调为了解决中国档案工作的缺点，要成立中央机关领导机关——档案局。米留申还三次致函周恩来建议成立档案局。通过苏联专家的介绍，中国更深刻地认识到档案工作的意义，了解了档案工作的正确做法，并决定建立国家档案局。1954年11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批准在国务院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25]。1954年11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家档案局组织简则》。这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档案管理体制的正式确立。新成立的国家档案局为全国档案工作提供了统一的指导和管理框架。其后，国家档案局不仅在政策层面上统一了全国档案管理标准，还在实际操作中负责协调各省、各部门的档案资源整合和管理。可以说，米留申的影响通过这种体制建设深入体现在中国档案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国家档案局的建立直接与米留申的动议有关，而《国家档案局组织简则》八条中内容与米留申所做的报告、草拟的文件或演讲对比，可以看到两者的联系。而米留申还草拟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档案局暂行条例（草案）》《各机关、团体、企业单位文书档案工作暂行办法（草案）》《各机关、团体、企业单位标准文件资料保管期间简短明细表（草案）》等文件，为档案日常管理提供了基本的规则。

其次，苏联档案专家对中国档案学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谢列兹聂夫不仅仅讲授苏联的档案学理论和实践，还直接参与了中国档案学教育课程的设计与教材的翻译工作。他帮助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档案学专修班，并主讲了档案学的基础课程。该班共举办三期，第一期101人，第二期99人，第三期111人。这些毕业生在除西藏、台湾省外的全中国各省市机关从事档案专业工作，他们同时“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意义、介绍苏联先进档案理论”^[26]。1955年，档案专修班的课程拓展为历史档案系，进一步完善了档案教育的体系，并培养了第一批具有专业知识的档案学人才。这一教育体系的建立为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谢列兹聂夫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的讲授并不仅仅是灌输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向学生们传递了档案学的科学方法和严谨的工作态度。这些学生日后成为中国档案学的骨干力量，他们不仅在档案管理岗位上发挥重要作用，还成为中国档案教育的传播者和建设者。通过谢列兹聂夫和其他苏联专家的努力，档案学教育逐步在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扎根。

此外，苏联档案专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政府档案管理理念与工作方法。苏联的档案管理方法注重系统性、科学性和政治性，这些理念成为新中国档案工作的核心内容，并影响了中国档案工作的实际操作。特别是苏联档案专家特别强调档案的政治警觉性，这也影响了后来中国档案管理工作的理念。档案被视为国家机密的一部分，档案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要确保有严格的保密措施，以防止文件泄漏或被错误处理。米留申在1949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召开的档案工作座谈会上就明确提醒，当时的管理机构“在档案工作中缺少必要的政治警觉性”^[27]。强调政治警觉性在今日也是各档案管理机关都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

5 结语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苏联不再向中国派遣专家。1960年7月18日，苏联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发出照会，决定撤走全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28]。中苏关系坠入冰点，大规模派遣专家的做法也成为绝唱。不过，通过对米留申、谢列兹聂夫和沃尔钦科夫等苏联档案专家的详细回顾，我们可以看到苏联档案专家对于中国档案事业的影响，他们不仅在档案管理上提供具体的技术支持，更在档案教育、管理理念、档案制度上影响着新中国的档案事业。■

注释与参考文献：

[1][14] 刘国能. 中国当代档案事业史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2] 陈子丹, 张志东, 王晗. “苏联模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的影响 [J]. 中国档案研究, 2017 (2): 3-15.

[3] 金波. 档案学导论 [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8.

[4] 张斌, 胡玲玲. 新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教学体系的创建 (1952—1955年) [J]. 档案学研究, 2019 (3): 4-9.

[5] 陈子丹, 张志东, 王晗. “苏联模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的影响 [J]. 中国档案研究, 2017 (2): 3-15.

[6] 吕晓庆. 浅谈前苏联档案工作对我国档案工作的影响 [J].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08 (7): 146-147.

[7] 方新德. 论建国初档案工作的“学苏联”问题 [J]. 档案学研究, 1995 (4): 6-11.

- [8] 韩玉梅. 档案学术交流: 中国·世界 [J]. 档案学通讯, 1996(4):71-74+9.
- [9] (俄) Поли Сурдяева. Вклад в развитие архивного дела Китая в 1950-х гг. по документам ЦМАМЛС, Платформа для публикаций,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 Сурдяева: 《20世纪50年代为中国档案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根据莫斯科中央档案馆私人会议博物馆的文件》, 出版平台, 档案文件. <https://pandia.ru/text/77/308/51699.php>.
- [10] 王明哲. 新中国档案工作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五十年档案工作的回忆与思考之一 [J]. 档案学通讯, 1999(6):11-16.
- [11] 凡. 简讯 [J]. 档案工作, 1956(7):17+20+24.
- [12] 王景高, 冯伯群, 李向昱编. 当代中国档案事业实录 [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93.
- [13] 坦噶尼喀外宾同国家档案局负责人座谈档案工作 [J]. 档案工作, 1963(6):4.
- [15] 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 [J]. 档案工作, 1955(4):26.
- [16] 格·伊·沃尔钦科夫. 苏联档案工作的组织 (在 1956 年 12 月 22 日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J]. 档案工作, 1957(1):5-9.
- [17] 格·伊·沃尔钦科夫. 苏联档案管理机构 and 档案馆鉴定工作的经验 [J]. 档案工作, 1957(2):25-28.
- [18] 格·伊·沃尔钦科夫. 苏联地方国家档案馆的建立及其接收档案工作 [J]. 档案工作, 1957(3):23-25.
- [19] 格·伊·沃尔钦科夫. 苏联档案机关利用文件材料的工作经验 [J]. 档案工作, 1957(3):26-30.
- [20] 韩玉梅. 翻译和出版了那些苏联的档案业务资料 [J]. 档案工作, 1957(6):7.
- [21] 米留申.《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档案局暂行条例(草案)》(1950年4月29日), 曹岩华译.
- [2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印发《关于档案工作及文书处理的参考资料》[EB/OL]. (1950-09) [2025-03-18]. https://xueshu.baidu.com/usercenter/paper/show?paperid=b783008ebd3f4a37e101befb153ceb80&site=xueshu_se.
- [23] 创刊的话 [J]. 材料工作通讯, 1951(5):1.
- [24] 张斌, 胡玲玲. 新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教学体系的创建 (1952—1955 年) [J]. 档案学研究, 2019(3):4-9.
- [25] 档案工作编委会.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的成立 [J]. 档案工作, 1954(12):1-2.
- [26] 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 [J]. 档案工作, 1955(4):26.
- [27] 关于档案工作的一般问题及中国档案工作目前的缺点——1949年12月27日苏联档案专家米留申同志在档案工作者座谈会上的报告 [J]. 材料工作通讯, 1951(12):16-18.
- [28] 沈志华. 苏联专家在中国 (1948—1960): 第三版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接第 44 页

据查档需求办结或分派到相关数字档案室处理, 档案室将查档结果通过短信即时反馈给申请人, 实现查档零次跑和电子出证服务。该场景实现“多源收件、一网办理”, 加强了查档数据的统一管理, 切实打通了部门间、馆室间的数据壁垒, 有效解决档案未进馆导致的群众查档难题, 切实提升了群众查档获得感和满意度。

5 总结与展望

通过全域一体化档案联动推进档案服务共同富裕示范区治理的探索与实践, 丽水市档案部门改变以往“单兵作战”的档案工作模式, 有效汇聚各方资源与智慧, 加强顶层设计, 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党委办公室(档案局)具体负责、局馆协作联动、各部门齐抓共治的档案多元共治新格局。同时, 敢于打破传统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 积极利用信息化技术, 聚焦基层档案工作的难点, 精准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 积极回应山区群众的查档需求, 以小切口、小场景、微服务为突破口, 尽档案所能, 找准档案工作服务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着力点, 形成“一地创新, 全域共享”的整体智治档案工作大治理模式。丽水在具体工作中提出的档案工作新模式、新机制、新方法, 具有较强的示范和推广价值, 对推进我国档案事业“十四五”发展规划实施、促进新时期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谱写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等具有积极意义。同时, 也为处于相似发展阶段、期望加快发展的地区, 提供了丽水山区宝贵的档案实践经验与借鉴范例。■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 [EB/OL]. (2021-06-10) [2024-12-20]. http://www.gov.cn/zhengce/2021-06/10/content_5616833.htm.
- [2] 村级档案管理赋能共同富裕的浙江路径 [J]. 浙江档案, 2023(11):51-54.
- [3] 共同富裕视域下档案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J]. 浙江档案, 2022(11):56-59.
- [4]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业农村档案管理工作的思考 [J]. 农业科技管理, 2024(10):47-49.
- [5] 姜策群, 李春云. 新时代我国乡村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考 [J]. 档案学研究, 2023(5):46-5.